

学人
文库

大变革时代

马勇 / 著
1895-1915年的中国



我们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来强调1895 - 1915年这个大变革时代的转折特征和意义。但这个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意义？

这其中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其中有多少颠覆我们传统历史的真相？

这其中还有多少你不曾知道的血与泪的交织……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大變革 時代

可風 / 著

1895-1915年的中國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95 ~ 1915 年的中国：大变革时代 / 马勇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141 - 2715 - 7

I. ①1… II. ①马… III. ①思想史 - 研究 - 中国 - 1895 ~ 1915
IV. ①G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9769 号

策划编辑：邓 敏

责任编辑：张 力 邓 敏

责任印制：王世伟

1895 ~ 1915 年的中国：大变革时代

马勇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37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esp. com. cn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0 印张 250,000 字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2715 - 7 定价：4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88191657)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引言

历史的发展总是呈阶段性的螺旋上升态势。在平静中孕育着突破，经过突破却又往往回复到先前否定过的阶段。当然，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因此，历史研究与历史解说的复杂性往往不在于我们是否认识到了“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能否透过“历史现象”本身观察那些“已变”和“不变”的本质与内涵。

近代百年的历史时段里，关键的年份有几个格外值得关注。其中 1895 年至 1915 年，就是近代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在这短短的 20 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的变化：先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洋务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然而几乎在“一夜之间”却不敌东邻日本，不仅经过几十年建设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且连清政府能否继续“合法性存在”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于是有甲午战败后启蒙思潮的发生，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崛起，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的萌生。正是在这些思潮与运动的催生下，终于迎来了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光绪皇帝的胆略与勇气一时间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不幸的是，戊戌变法仅仅存在了 100 天，便被西太后轻轻一击而推翻，中国历史似乎回复到变法运动之前。

西太后的镇压使进步的中国人感到失望，可是正当这种失望继续蔓延的时候，却不料西太后自己宣布了“新政”，公布了“筹备立宪”的时间表，确定以清政府为主导继承戊戌维新运动的精神遗产，推动中国继续前进，清王朝也似乎在这种变革的氛围中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20 世纪初年的新政在近代中国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教育等方面在制度层面的变革差不多都兴起于这一时期。然

而当新政的日程表还没有最后排定的时候，新政的政治目标尚未实现的当头，新政的“主体”清政府却在“一夜之间”由“一个只不过是士兵组成的团体成功地发动一场并无充分准备的革命”^①而推翻，中国历史又一次发生重大转折。

清政府被推翻之后，建立了民国，民主共和的新体制开始在中国建立。然而中国人仅仅经过一个为时并不太长的高兴，便又一次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先是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接着是1915年的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历史经过短短20年的“周折”，却又回到了它的起点。难道中国只能实行“帝国”的政治体制吗？中国人难道只能在“皇恩浩荡”的荫庇下做“顺民”吗？中国人经过20年的“折腾”又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从上述情况看，1895—1915年的中国政治发展，不仅构成近代中国发展变化的一个分水岭，而且实在是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一个缩影。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全面地阐释这20年中国政治变化与思想变化的内在关联，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怎样从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怎样摒弃纯物质主义、国家主义，转向构建一个现代国家，可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启示。

① [美] A. W. 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引 言 001

大变革时代：缘起、主题及意义 / 001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 / 001

跛足现代化 / 005

洋务首次大考 / 008

东北亚危机 / 013

洋务终局 / 016

转向维新 / 020

激进不是问题 / 023

想象的后果 / 029

由内政而外交 / 032

新起点 / 038

新气象 / 042

像日本那样：君主立宪 / 047

现代文明曙光乍现 / 055

“有计划政治”破局 / 060

两大败笔 / 065

一个王朝悄然退出 / 069

从南京到北京 / 073

共和早春乍暖乍寒 / 080

宋教仁之死 / 084

二次革命 / 092

鬼迷心窍的帝制 / 096

第一章 中国的唯一希望 103

可怕的预感 / 105

内耗与日俱增 / 109

浪漫的政治理想 / 113

变革的极限 / 117

中国唯一之希望 / 121

历史的偶然 / 122

民族与种族 / 126

第二章 谁能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131

西太后为何翻脸 / 133

从器物到制度 / 135

谁来承担甲午战败的责任 / 140

保国与保种 / 145

列强在中国的目的 / 150

权与利：政变的本质 / 155

谁是保守主义者 / 158

留给历史的遗憾 / 166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诉求与失望 195

清政府的两难选择 / 198

谁是改革的阻碍者 / 202

皇权与民权 / 206

立宪与共和 / 210

革命与改良 / 213

理想与现实 / 219

第四章 政治现代化的尝试与失败 225

- 现代化的必然诉求 / 227
- 权力危机 / 230
- 解决权力危机的两种思路 / 236
- 学理探讨与政治运作 / 240
- 政党政治的竞争规则 / 245
- 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 / 249

第五章 现代化的思想资源 265

- 意义世界的丢失与寻求 / 267
- 信仰的崩塌与重构 / 273
- 权威的丧失与恢复 / 278
- 新传统主义的泛起 / 281
- 国体虽更而纲常是否必变 / 285
- 对共和与文化传统内在关联的迷惑 / 290
- 新传统主义的困境 / 297
- 反传统思潮的崛起 / 301

大变革时代：缘起、主题及意义

《1895—1915 年的中国：大变革时代》的基础是十几年前出版的《1895—1915：梦想与困惑》（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市场上早就不见踪影了，作者个人没有想着重印或再版。这一次之所以有机会重见天日与读者见面，主要应归功于经济科学出版社编辑邓敏女士的敏锐与敦促。

由于这本小书已经出版十几个年头了，作者虽说没有离开这个领域太远，毕竟学术界的进展，以及个人认识的变化，在原稿上增删并不那么容易。最近几年，作者对这个大变革时代的看法陆续发表，有心留意这段历史的同好或许已经看到。这本小书只能在大框架不变前提下略加修饰调整，明显的错误予以更正，能不修改的，还是尽量保持原样。为了说明作者过去 10 年的浅见以及与这本小书的不一样，于是有了这篇概略性文字。

三千年未有之巨变

我们在讨论 1895—1915 年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意义时，总喜欢引用“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个经典说法，以此强调这个时代的转折特征和意义。

从大历史背景说，1895—1915 年中国所遇到的大事，在过去 3000 年确实没有遇到过，说是 3000 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为过。但，这个未有之大变局究竟蕴涵着怎样的意义呢？

由 1895 年往前追溯 3000 年，也就是公元前 1100 年的时候。这个时候

正是周朝建立初期。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推翻了商朝，定都镐京，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这275年的历史，史称西周。

从西周往下3000年，也就是1895年之前的3000年，究竟应该怎样评估，还值得仔细研究。过去许多人根据西方历史理论，将这3000年视为中国的“封建时代”或“中世纪”，现在看来可能并不准确。从中国历史本身观察，中国在经过夏商两个漫长王朝犬牙交错的冲突、组合之后，至西周王朝建立，大致上说，中国历史开始向统一的帝制时代迈进。周天子虽说只是众多诸侯的“共主”，但其功能与夏商时代还是略有不同。

当然，西周只是开启了走向统一、走向帝制的进程，并不是说西周就是统一，就是帝制。从西周到东周，从春秋到战国，至秦王朝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海内，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相继兼并韩、魏、赵、燕、齐东方诸国，前后不过十余年，终于将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送进历史，终于构建一个影响至今的庞大帝国。

在秦帝国建立前的825年，也就是从西周建立至秦王朝建立的这段时间，其实就是中国走向统一、走向帝制的过渡期。从秦以后，至1894年的二千一百多年，如果从纯粹的政治史来说，就是最为典型的帝制时代和统一王朝时期。在这期间，虽说更姓易代数十次，但政治上的基本架构、设施，只是较秦王朝更加严密更加周详，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变化。中国只是在帝制的框架中修补调整，大有“历史终结”的味道。

2000年的帝制为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17世纪之前很长时间内，中国文明引领了世界，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文明启发了西方，诱发了工业革命，诱发了文艺复兴，诱发了启蒙运动。这个详细过程我们今天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长时期纠结于近200年的落后。但，我们绝不应该低估古代东西方交往的频率及力度，不能低估中国文明对世界历史的积极影响。只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全新时代开启了。

中国文明的本质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农业文明与政治上的帝制、大一统相匹配，完美无缺，将农业文明的好处发挥到极致，因此等到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等到他们能够自由使用中文阅读中国文献时，他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美。这是历史事实。

问题在于，中国极致的农业文明束缚了自己再发展的手脚。西方在15、16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渐渐地，工业文明出现，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纺织工人发明了纺纱机，极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稍后，理发师阿克莱特对凯斯的发明加以改进，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1785年，牧师爱德蒙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厂。

更重要的发明发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为近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动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必将在这个强大动力系统推动下发生革命性变化。

英伦三岛的蝴蝶展开了自己的翅膀，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必将受到这只小蝴蝶的影响。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作为特使出访中国，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回应英国工业革命？经南方吹进的这股新风能够改变中国历史走势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近代中国，其实就是怎样回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尽快将中国先前的农业文明转换成工业革命，追随西方一起往前走。在具体方式上，就是开放市场，将中国由先前的农业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工业形态。从后世情形看，西方巨大的资本冲动，除了市场、利润外，主权、土地、人民并不是资本的争夺目标。

其实，在中西交流之初，贸易往来就是一件重大事情。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市场不发育，中国老百姓缺乏购买力和消费习惯，西方工业产品在中国沦为士阶层、商人阶层，尤其是贵族阶层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相反，中国的初级产品，特别是瓷器、茶叶和丝绸，却随着中西交往成为西方社会普遍喜爱的物品。中西之间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马戛尔尼1793年出访远东的真实背景，英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放开市场，让英国资本比较自由地进出，让中国政府同意构建中英两国新型的外交关系，以大致维持中英贸易均衡。

中国此时正处在正统史学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个盛世用后世眼光观察带有非常浓厚的虚假痕迹。中国人不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中国人的贸易理念、货币观念太陈旧，不知道国际贸易真谛在哪里。中国人认为，你们英国人喜欢我们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你们为此支付巨额真金白银都是应该的。所谓贸易，就是你拿钱买我的东西，真金白银单向流向中国，说明中国具有吸引力，是天经地义。因此，中国政府无意改变中英之间贸易不均衡，更不会让英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开发市场。“我的地盘我做主”，于是乾隆大帝在接见马戛尔尼时明确而傲慢地拒绝了英国人建议。中国和平转型至工业化时代的希望化为泡影。

马戛尔尼使团中国之行以失败而告终，中英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仍然无法获得解决。渐渐地，英国不法商人竟然以鸦片为商品，试图以这种不道德的手段消解中英贸易不均衡。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很快使中英贸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转，大量真金白银外流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鸦片泛滥既使国库空虚，朝廷已无可可用之饷，更使大量中国人染上毒瘾，沦为东亚病夫，中原已无可可用之兵。

两大困境折磨着中国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鸦片贸易并不单纯是英国商人的问题，中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广东负责贸易管理的官僚，实际上也是鸦片贸易的重要受益人。清廷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长时期犹豫不决，进退两难。1836年，许乃济建议鸦片贸易合法化，建议国内种植价格更加低廉的罂粟，以国产冲击进口，以价格优势占领市场，以此保证朝廷财政收入。

许乃济的建议是纯粹的贸易原则，事实上对于当时中国来说，鸦片的危害更多的还是对中国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时知识精英大多主张从源头上动手，严禁吸食鸦片，强调堵住需求，扼住市场，没有人吸食鸦片，鸦片贸易自然终结。这是黄爵滋1838年向朝廷提出的重要建议，代表了大多数知识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对于鸦片危害非常痛心，他对黄爵滋的建议很感兴趣。他将这

个建议批转各省督抚进行讨论。各省督抚对黄爵滋严惩吸食者的建议虽说并不明确反对，但总觉得这个办法太激烈，毕竟吸食鸦片只是个人爱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鸦片危害的根源在于鸦片贸易，只有堵住贩卖环节，才能消除鸦片危害。

各省督抚不太赞成黄爵滋的方案，唯林则徐以为黄的方案可行。林则徐在给朝廷的回复中建议，既要对那些贩卖鸦片者处以极刑，也不要放过那些吸食鸦片者。

林则徐对各种方案的综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于是朝廷很快召林则徐进京，商讨大计。据说林则徐与道光帝悬谈了19次，研究禁绝鸦片及其贸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则徐全权，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解决鸦片泛滥问题。

3000年未有之巨变的最大考验，就是中国能否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以及中国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方式完成这个转变。林则徐不论用强硬的，还是柔性的办法去应对西方，中国都必将通过化解鸦片危机而与世界沟通，重建关系，这在当时已被许多人朦胧意识到。

跛足现代化

鸦片在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毒品泛滥，而是中外贸易。在英国和印度看来，鸦片与瓷器、丝绸、茶叶并无二致，以鸦片为内容的贸易毕竟还是贸易，而不是犯罪。英国人几十年前的关切是贸易失衡，是英国白银流往中国，现在英国人的关切是维持贸易现状，维持贸易利润。因为英国对中国不愿接受外国资本自由出入非常恼火，很早就想找碴一次性敲开中国大门。

林则徐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具威望的政治家，是坐而言起而行之人，他抵达广州不管不顾，按照预定方案发布告示，要求外国商人将已经运到中国而尚未卖出的鸦片尽数交出，并出具书面保证承诺以后不再往中国贩卖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

严厉措施引起外国商人高度恐慌。迫于压力，一些商人交出了鸦片，提供了保证。这些外国商人的举动激励了林则徐，使他觉得应该乘胜追击，擒贼擒王，捉拿英国商会会长颠地。制伏了颠地，就制伏了英国，也就解决了鸦片泛滥问题。

林则徐逮捕颠地的命令引起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警惕。义律认为，林则徐的这个做法即便不是战争，也是中英战争的前奏，是对英国贸易权益的严重侵犯，毕竟鸦片作为贸易物品由来已久。由此，中英关系日趋紧张，战争气氛骤然加剧，终于引发一场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

鸦片战争表面上因鸦片而战，其实战争结束后鸦片贸易并没有禁止。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失败不在战场上，而是战争结局根本没有改变中国一丝一毫。也就是说，中国国际贸易收支依然无法通过正常贸易实现平衡，鸦片依然是英国平衡对华贸易的重要手段。

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弄清英国人不惜战争的根本目的。中国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历史机遇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兴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国上下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浑浑噩噩度日，继续陶醉在中国文明昔日光环之中。

中国在犹豫徘徊中错失 20 年发展良机，直至第二次以鸦片的名义与英法联军开战失败，《北京条约》签订，中国方才大梦初醒，步履蹒跚踏上学习西方的不归路。

根据《北京条约》，中国与西方诸国重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外国公使进入北京，中国也将逐渐向西方各国派驻自己的使臣。这在今天看来非常一般的事情，在当年却是费尽周折，仿佛外国人入住京师，好像就要亡国一样。

《北京条约》的另一项规定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让外国资本、商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这些措施从今天的贸易观点看，再正常不过了，但在当年也是一阵恐慌。

洋务新政更实质的意义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在当时被称为“夷务”，后

来被称为“洋务”。所谓洋务，就是由政府主导，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经济。由于这个方式的便捷、高效，中国在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不久，就见到了成效，中国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充分消化了德国最先进的技术，就能够在外国技术人员帮助下，比较顺利地制造出与西方技术相差不大的洋枪、洋炮和巨轮。这不仅让那时的中国领导人觉得很有面子，而且使中国领导人更自信。不只自信中国能够学西方，而且自信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

这些看法是中國人在30年洋务新政中的一般看法，也受到中国人的普遍相信。事实上，中国经济在那30年几乎毫无回调的机会，一路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在明显恢复。历史从来不会谴责、责怪成功者。

清政府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诚意当然不必怀疑，也正因为清政府将所有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发展经济上，因而在那几十年，中国先前奉行几千年的王道主义渐渐边缘化，以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倡导、认同被儒家文化视为异端的物质主义，也就是后来被严复规范的进化论、达尔文主义。

从传统儒家立场看，以力的角逐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这种霸道与儒家伦理奉为至上的“王道”不是以道里计，而是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几千年的中国，凭借着王道，凭借着文明的软实力不断扩大着自己文化的和政治的边疆。到了近代，中国是否应该因为西方的压力而放弃王道主义原则，放弃自己应该担负的宗主国责任呢？今天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但在当年却是肯定的，因为当时中国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要么被人吃掉，要么吃掉别人。

基于这种因素，洋务新政将一切都归结为发展，归结为实力，以为中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不是运气，不是正义非正义，而是实力不如人，是物质基础、是枪炮弹药不如人。落后就要挨打，就是那时的共识。要想不落后，要想不挨打，只能像西方一样，强大自己，壮大自己，走进丛林，和西方一样强大，一旦将来再遇到列强胆敢上门欺负，强大的中国就能绝地反击，报仇雪耻。

洋务新政的设计是好的，也是有成效的，中国确实应该走进丛林，按照丛林法则与列强共事。只是“丛林法则”并不是单纯的孤立主义，也不

是物质至上，更不是单纯的船坚炮利。西方的强大是一个系统，“丛林法则”本身就是一个法则，并不单纯看哪个狮子大，哪个老虎更凶猛。

洋务首次大考

19世纪60~70年代，清政府委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军政大员，负责引进外国技术和技师，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马尾船政局等。这些工厂虽然采用陈旧的官僚管理体制，只不过生产了一些轮船枪炮，但其意义远过于其成就本身。因为这些早期洋务军事工业是中国民族工业发生、发展的直接动因甚至是其前身、前提或基本条件。19世纪70年代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早已平息，中外争端亦逐渐减少，清政府暂时赢得了一个较19世纪40~50年代更为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再加上洋务早期所举办的那些军事工业自身不可克服的腐败及局限性，一直被批评为“不足御侮，徒添靡费”，于是不得已将发展重心由军事工业逐步向民用工业转移，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总局、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相继问世。这些企业固然是中国官僚资本的最初形式，其目的也不在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些企业既然接纳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投资，遂使其中一部分人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

前身。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伴随着洋务而出现，但它在本质上是洋务主导者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对立面，为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的质变准备了一个新兴力量。假如中国19世纪末不发生那些突发事件，中国也必将在这个新兴力量引导下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欧洲资产阶级为自己准备了掘墓人一样，中国政治统治者允许洋务发生，允许民族资本成长，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培养掘墓人。这就是历史悖论。

30年洋务新政为中国新阶级、新阶层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使中国综合国力获得了空前提高，至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国势虽说尚未恢复到康雍

乾盛世，但至少已经度过两次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尴尬，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在政治层面发生多大变动，但在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气象、态势，并不逊于当时的日本。当然，这种假象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中国人。

就社会文化层面来说，这30年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巨大变化，西方物质形式全面引进，洋货充斥中国社会文化物质生活许多方面。然而就政治体制和根本方面来说，清政府固守先前体制，抱残守缺，30年少有变化，结果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中国以东亚大国的身份败给东邻小国日本，无疑为30年洋务新政做了结论——洋务新政只是一场“跛足近代化，洋务新政至此基本画上了句号。

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中国危机，中国在被迫步入现代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中，通过向西方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生机，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既使中国赢得了某些自信，实际上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变故预留了空间，准备了种子。而1884年外交危机最足以说明这场跛足现代化运动带给中国的多种意义。

19世纪80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微妙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内地，将整个中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我国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

南部边陲的越南，长时期为中国藩邦，但在这个时候，由于中国外交转向内顾，越南逐渐向东来的法国靠近，逐渐有意脱离中国。

法国对越南的觊觎很早就已开始。1859年，法国军队占领西贡，之后不久相继兼并了南部诸省，拥有对越南南部实际控制权，中越宗藩关系受到严重挑战。

1874年，法国政府强迫越南当局订立和亲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承认安南（越南）独立，实际上是将其列为保护国。条约宣称，法国有义务保卫安南政权不受外国侵犯和干扰，唆使安南将刘永福和黑旗军驱逐出境。对于法国迫使安南签订的这个条约，清政府当时无力干涉，但坚守安